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三期 ——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12c)

【风雨人生】	老五届大学生	卢达甫
【抗拒遗忘】	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荃	于小康
【往事非烟】	北京男八中的一段往事	沈 宁
【不堪回首】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彭 古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十七)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风雨人生】

老五届大学生

• 卢达甫 •

—

1970年从北京大学分配到安徽省，2006年在铜陵日报退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人生的意义，还没完全彻悟生命的全部价值，大半辈子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过去了……

在皖南小城铜陵不好不坏过了30多年平民生活，周围环境的长期熏陶，我似乎已被同化成安徽人，也渐渐淡忘了自己的北大身份。可平时常有朋友问我：“你是北大的，怎么到这小地方来？太亏了……”我只能简单解释：“我是北大老五届的，1970年文化大革命最厉害的时候，分配到安徽来的。安徽来了500多个，铜陵有十几个。走的走，死的死，现在留在铜陵还有五个北大的。”朋友半信半疑，用同情的口气问：“你们北大的都当大官了吧？你怎么还在地市小报当编辑？”我老老实实地说：“我们北大当官的不多，书卷气太重。我们文一（3）班35个人，县级以上官员只有八九个，三分之一不到……”朋友很不理解，疑惑地问：“那么多年了，你怎么也不挪动一步？比如调北京、上海、杭州、合肥、宁波……”我无言以对……问

多了，真想写篇《老五届大学生》，试图用文字理清老五届大学生几十年命运的来龙去脉，好给关心我的朋友解惑释疑。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先吓了一跳，好大的题目，十几篇几十篇文章都写不完，几本十几本书都写不尽。老五届大学生的命运分文革前，文革期间，文革后；老五届大学生的范围与对象十分广泛，全国所有高等学校都有老五届大学生……想来想去，只好删繁就简，时间线索用取舍法，文革前舍去不写，文革期间详写，文革后略写。范围与对象用选择法，只选择人们关注的北京大学，写和我一起走进铜陵的十男一女老五届北大同学。用一句老掉牙的话来说，也许这就叫作“解剖麻雀”“窥豹一斑”。

二

老五届大学生，是指66、67、68、69、70届五届大学生。1968年初冬，工宣队进驻北大、清华，66、67届的学生先后分配走了，68、69、70届学生留在学校搞斗批改，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1970年春节刚过，就传来要提前分配的消息。听说马上要招收工农兵新大学生，我们这些“封、资、修”的老大学生，自然要扫地出门。一开始，听说北大、清华的学生集中到青海一个农场劳动半年，每人每月发38元生活费，报到中央没通过。后来国家计委做了一个分配方案，都是大城市大单位，报到中央又没通过。最后来了一个指示“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学校，面向部队……于是乎，不到一个星期，一两万北大清华学生，像狂风吹枯叶样满天乱飞，落叶纷纷坠地……又好似撒豆子一样，一下子撒到全国各地社会最底层……除了每个班级有一两个出身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子女留校留京外，上海、天津、南京、广州、成都等省会大城市一个名额都没有。越是落后贫穷的省去的人越多，西南的贵州与东北的辽宁都分去了1000多北大学生，安徽500多个……离开北京的那几天，伤感的北大学生在北京火车站哭成一片，带着文革的心灵创伤，怀着困惑、迷惘、失落的悲凉情绪，离开了首都北京，离别了母校北大……

1970年3月15日下午，天色阴沉沉的，一列从北京开往上海的火车缓缓停在蚌埠站。500多个北大学生脚步沉重没精打采地走下火车，满眼忧郁满面迷茫地站在脏兮兮的车站广场，望着一大批蜂拥而上的灰头土脸满身破烂的乞丐发呆……部队农场的解放军营长站在军用卡车上，面对大学生用很难懂的淮北话说了几句，一声令下，大学生们七手八脚爬上了军用卡车……车过蒙城、利辛，望着公路两边目光呆滞衣衫褴褛面容枯黄的农民，望着歪歪斜斜破破烂烂的灰黑草房，望着不远处无边无际荒凉空旷灰蒙蒙阴沉沉的淮北大平原，刚出繁华京城才一天一夜的大学生们，脸色越来越难看，满心悲凉地想：可怜啊，我们这批倒霉的大学生，真的是被发配流放了……这鬼地方……这不毛之地……解放都21年了，中国怎么还会有这么穷的地方？……

军用卡车沿着坑坑洼洼的马路开到阜阳插花镇6377部队时，天已黑了。黑灯瞎火吃了一顿晚饭：大锅饭，红烧萝卜，青菜汤……分好班排连，正式开始了部队农场的劳动改造生活……住的是劳动大学留下来的低矮潮湿的旧平房，睡的是四块土坯垫起来的木板稻草床，没有电灯，一盏煤油灯昏黄黯淡凄凉……挖井，挖水渠，种蔬菜，种麦子，种大豆，养猪，抬水泥电线杆子，秋收扬场脱粒……繁重的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压得弱不禁风的大学生喘不过气来……每天黄昏，精疲力竭的大学生站在营房门前，目光迷惘地望着远处茫无际涯荒芜空寂的淮北大平原，真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路在何方……可在地头看见机耕道上十八个淮北农村妇女，拉着一辆古代战车样笨重的铁皮木轮大粪车，唱着“大学生哟，嗨嗨……到淮北哟，嗨嗨……娶一个哟，嗨嗨……乡下妞哟，嗨嗨……养一个哟，嗨嗨……胖小子哟，嗨嗨……”的时候，又感到新鲜好奇……有时走进部队农场附近的村庄，看见满脸菜色端着粗黑饭钵蹲在地上大口吃着山芋稀饭的乡亲，望见他们身后低矮破烂潮湿阴暗的泥墙草房，落难大学生尚未完全泯灭的忧国忧民的

情绪，又会在他们苦涩的心中悄然滋生……

淮北平原的芨芨草开了又谢，谢了又开，1971年3月，又要分配了。分配去向几乎都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那几天，呕吐的，失眠的，沉默寡言的，自言自语的，外出彻夜不归的……什么都有，出尽洋相……再分配方案部队农场定，部队农场干部大权在握，全凭大学生在农场一年的表现好坏决定分配去向。所谓表现好坏是：和部队农场干部处得好的分到省会合肥，和部队农场干部吵过架有矛盾的统统分到淮北农村，和部队农场干部相处还好出身资本家地主的照顾分到皖南山区，和农场干部不好不坏人还老实的分到蚌埠、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等中小城市。我们分到铜陵特区的十一个同学，大概算是不好不坏中不溜秋一类老实学生……

三

1971年4月，芜湖到铜陵刚刚通火车。清明节一过，分配到铜陵的北大同学先先后后从上海、江苏、浙江、福建老家到铜陵报到。我是最后一个到铜陵，从浙江余姚老家坐火车到上海，再从上海换乘到铜陵的火车。一路上，满眼浓绿，绿色的山，绿色的水，绿色的田野，绿色的天空……铁路沿途漂亮的城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似乎也被这绿山绿水绿色天地染绿了……火车开出南京，进入安徽境内，铁路两旁的绿渐渐稀疏，还夹杂着一片枯黄……过了芜湖，绿色的田野突然消失，铁道两旁全是灰褐的荒山野岭，一座座长满野草杂树荒芜的山过去了，又一座座遍体鳞伤裸露的山过来了……铁道两旁稀稀拉拉的农家村落，除了低矮灰黑的泥墙草房，还是灰黑低矮的泥墙草房……我突然感到心慌意乱，真没想到皖南还有与淮北一样荒凉、贫穷、落后的地方……我急忙拿出安徽地图册，翻开一看，芜湖、马鞍山的城市标志有一大一小两个红圈，铜陵只有一个小圈……我的心突然往下沉：完了！完了！看来情况不妙，我是分到了安徽省最小最差的城市了……

火车开得很慢，每一个小站都停，到达铜陵时天已黑了。车站广场还没完全建好，一出站就踩了一脚泥巴。七打听八打听找到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一进门就听到北大同学熟悉的说话声。他们早来了，歪在房间床上天南地北吹牛聊天。看见我姗姗来迟，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开玩笑说：“怎么才来？在家找到老婆了？被小娘子拖住了？”……夜里，同学们聚在招待所房间，苦中作乐，嘻嘻哈哈说笑到深夜，可那海阔天空不着边际的穷吹瞎聊，却无法掩饰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痛苦、失落与迷惘……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起床了，忐忑不安地到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报到。走上一条狭窄肮脏粗糙的水泥马路，前后左右一望，除了特区革委会招待所、长江饭店、百货公司三座旧楼，沿路都是清一色的平房草房。路上没有轿车，来来往往都是装满矿石的大货车。路上几乎见不到年轻的小伙子与大姑娘，可能都下放到农村去了。马路上慢吞吞行走的，大多是穿着藏青色工作服戴着矿帽的中年老年工人……百货公司前面十字路口，居然还有一头肥大的老母猪，不慌不忙旁若无人地在路中央转悠……我傻乎乎地拉住一位老工人问：“老师傅，请问铜陵的大街在哪里？”老师傅笑了：“这就是铜陵的大街。从百货公司到五公里特区革委会，正好五公里长……”同学们一听，面面相觑。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一声长叹：“天哪，这也叫城市？就是个工矿区么。还没有我们江苏一个集镇大。”数学系的王同学一跺脚：“完了！完了！这辈子彻底完了！不活了！跳长江去！”物理系贝姓女同学再也控制不住，“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没精打彩走进特区革委会大楼，组织小组的女干事陈同志很热情很客气，端水倒茶让座，还笑容满面地介绍了铜陵的情况：“铜陵原来是个工矿区，产铜为主，叫铜官山矿务局。1956年10月12日建市，市区分山上、山下两块，山上是机关与商业区，山下有冶炼厂、发电厂、横港大轮码头。离市区20多里的狮子山铜矿，50多里外的凤凰山铜矿，还有江北的飞地枞阳井边铜矿，江南的飞地贵池铜山铜矿，都属于铜陵特区，很分散……每个学校都缺教师，

你们来了正好……”我们一听脸都白了，北大学生最怕当老师了，那年月教师是“臭知识分子”，最被人瞧不起，还不好找老婆。陈同志的话还没说完，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与数学系的王同学争先恐后慷慨激昂地说了起来：“我们是北京大学，不是师范大学，不会当老师，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专业对口……”陈同志微笑着很有耐心地听着，过了一会，想了想说：“铜陵是个新城市，各行各业很需要人，我今天就给省革委会组织组打电话，你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清晨，我们赶早在组织小组门口等候，陈同志一见面就抱歉地笑笑：“省委组织组不同意，还是要当老师……”同学们一听傻眼了，赖在组织小组不走。陈同志连哄带拉，把我们十一个人一个一个推送到同在一层楼道的教育小组……

四

性格各不相同的北大老同学，刚到铜陵时命运相同——几乎都当中小学老师，最后的归宿与结局却大不相同。

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张同学分到铜陵最好的学校一中教英语。他面有难色地说：“我是学法语的，不会教英语。”教育小组的军代表理直气壮地说：“英语法语都是外国语，怎么不能教？”张同学哈哈大笑：“高见！高见！高……实在是高……”拿起调令第一个报到去了……报到后张同学走进一中英语教研室，夸张地挥挥手，一声喊：“老英同志们，你们好！我老法来了！”从此，张同学得了个外号叫“老法”。张同学老法很聪明，边学边教，现学现卖英语教得很漂亮。他在文化革命初期患了眼疾，一直在北大校医院住院，几乎与世隔绝。大学还没毕业，就提前在老家江苏武进找了个医生老婆。张同学老法似乎看破了红尘，夫妻两地分居后，好象没想过调老婆到铜陵，也没想到自己要调回武进。他从早到晚只看一张《参考消息》，上完英语课就到老同学那里去聊天吹牛，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1977年省里来选招外语人才，张同学接到市委组织部通知，参加了笔试面试，没想到省会合肥没去成，糊里糊涂从一中调到了铜陵有色金属公司情报处当翻译。过了两三年，又稀里糊涂被调到有色经贸部……最后几年，张同学的主要工作是把铜陵有色公司的黑矿砂，运到江苏南通去销售。北大西语系法语专业的学生，成了一个称职敬业的销售员……老婆退休后到铜陵定居，夫妻总算团圆了，当了二三十年单身汉的张同学，快到退休时才过上真正的家庭生活……

化学系的沈同学是上海人，分到二中教化学。二中坐落在一个山坳里，三面高山密林环绕校舍，夜里常有猫头鹰怪叫声，阴森恐怖……面对如此恶劣环境，沈同学有苦难言，从早到晚郁郁寡欢……我们十个同学在铜陵举目无亲，只有沈同学的父亲在铜陵工作，是1959年从上海支援内地建设到安徽，在铜陵工商局当会计。老沈豁达大度，看见我们几个愁眉苦脸，诚恳劝慰：“我是解放前中央大学毕业的，当今国务院副总理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你们可到过杭州灵隐寺？一线天上有几个字——知足常乐……”我们都知道人要知足，可此时此地此境，我们这些落难的大学生，又怎能快乐？

沈同学在父亲潜移默化影响下，随遇而安，老老实实教书，清清白白做人，不久就很现实地和华师大毕业的一中女教师恋爱结婚了。两人都是上海人，很快就调上海了……不知如今他在上海是当老师还是当校长，没有消息。铜陵是北大老五届学生的伤心地，一走了之。

我分到三中教语文。三中在工人医院后面一大片长满松树的山坡上，学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两栋旧楼，几排平房，一片荒凉破败……我的心全凉了。幸亏三中的领导与老师对我很好，苦涩的心略感安慰。我只上了一堂初二的语文课《国际歌》，浙江方言太重，口齿不清，学生听不懂我的话，只好帮别的老师改学生作文打发日子……我趁机向学校提出要调离三不当

教师，还三天两头跑特区革委会组织小组找陈同志……心情压抑地在三中挨了一天又一天，1972年8月，我总算调到了文化局……

摘掉了教师帽子心情理应好一些，可我到了文化局依然闷闷不乐，从早到晚像哑巴一样不说一句话……1976年春，心血来潮写了个喜剧黄梅小戏《追木匠》，在铜陵合肥演得热火朝天。没想到一出小戏会闹出一场政治风波，有人发难说小戏从头到尾没提一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大毒草。是香花是毒草，我心里有数，一笑了之……1978年，我又找了已是市人事局长的陈同志，匆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调到新创办的铜陵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文学概论》去了。

铜陵师专最早在山下的“五七干校”，两栋红楼，三排平房，背靠荒山，面对湖滩……环境恶劣，条件简陋，我却干得十分卖力。我的学生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每次上课望着他们饥渴的目光，我总有同病相怜的感觉……1982年恢复业务职称评定，学年限划到68届。我是70届，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69届，却都被学校破格评上讲师报到省教委……没想到最后职称批复文件上，却没有我与浦同学的名字……正好那一年师专改办财经专科学校，没有中文系了，我就开始联系调浙江……更没想到，1983年8月，一纸调令把我调到了铜陵日报，在副刊部主任的位子一坐就是20多年……今天回头看看自己在铜陵走过的路，忽然发现自己既不像老师，又不像干部，也不像文化人……“三不像”了。有时，连我自己都弄不清楚：我是谁？我在安徽铜陵失去了自我……

想起数学系的杨思明同学我就痛心疾首。杨思明是福州人，北大数学系数学力学专业的高材生，分到四中教数学。他满腹学问，不能进中科院研究固体力学流体力学，却在一个偏僻工矿城市当孩子王，情绪自然十分恶劣。每次老同学见面，说起当老师他就愤愤不平，一生气说话有点急……有一次，西语系的张同学开玩笑说：“你干脆装结巴，不就可以免当老师了？”没想到，这个漂漂亮亮高高大大的小伙子真结巴了。他用浓重的福建口音结结巴巴讲了一堂数学课，惹得学生哄堂大笑。校长哭笑不得，只好不叫他上课，安排到校办工厂打发时光。杨思明不甘心，一有空就朝教育小组跑，煞费苦心想调出学校。炎热的夏天到了，教育小组有几位同志住家地势偏高，夏季常断水。杨思明竟放弃暑假回福建探亲的机会，常帮他们挑水。教育小组的人终于被感动了，叹了口气说，我们向领导汇报一下，明年给你动一动。杨思明一激动，又结巴了……

第二年8月，杨思明调到凤凰山铜矿机修车间当了一名镟工。好不容易当上了“工人阶级”，杨思明笑口常开，情绪好多了，结巴不治而愈。星期天，我们老同学到凤凰山找杨思明玩，他正趴在矿工宿舍的鸽子床上读英语，床头摊满了《固体力学》《流体力学》这些专业书。同屋的矿工敬佩地说：杨大学生真用功，天天啃书到深夜，还想回北京研究飞机火箭呢。那时我已离开三中调到文化局，杨思明心情好了，也常到市区找我玩，看看电影，逛逛书店。有一天，杨思明向我借了套《红楼梦》，还对我说：矿里搞“双革挖潜”，动员地表工下矿井，他想下井干一段时间，多弄点钱，国庆节回福建与未婚妻完婚。我说：“老兄，你别乱来，井下危险！”他淡淡一笑：“哪会那么巧！结婚后，我还想带爱人到凤凰山上玩玩，在相思树下合个影，然后……”他朝空中一挥手，做了一个远走高飞的潇洒动作，满脸幸福……

可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几天后突然传来噩耗：凤矿井下冒顶，杨思明被压死了！我们十个北大老同学都惊呆了，发疯似地狂奔到凤凰山，却只见老同学血肉模糊沾满泥沙的残体……和杨思明一块下井的矿工告诉我们：冒顶时，杨大学生是倒数第二个跑出来的，快脱险时矿帽掉了，可我们这位老实得可爱的老同学，又跑回去找矿帽，因眼睛近视在巷道摸索，无情的巨石就这样吞噬了年仅26岁的生命……几天后，杨思明的亲属从福建赶来，我们老同学去长江饭店探望时，才知道杨家三世单传，世代惟一的大学生，却在他乡夭折血脉断流。老同学泪流

满面，无言安慰……第二年清明节，十个老同学给杨思明扫墓，面对一抔黄土一块残碑，却只能无声长叹，再也流不出一滴眼泪……

数学系的王同学与物理系的贝同学，两个一男一女上海人分到狮子山五中。这是一个铜矿生活区，四面青山环绕，山C里一条两公里不到的石子路，路两边全是灰头土脸简陋低矮的旧平房。在这偏僻闭塞的山沟沟里，突然来了两个文质彬彬的男女大学生，分外引人注目……王同学在五中教工业基础课，贝同学教农业基础课，不到一个月，就成了五中最厉害的老师。老同学见面，常开玩笑喊王同学为“工基霸”，喊贝同学为“农基霸”。贝同学臊得满脸涨红，王同学则破口大骂：“你才X X！”……不到两年，王同学在上海找了个老婆，贝同学在南京找了个老公，调走了。两个上海籍的北大同学，在铜陵如蜻蜓点水，一闪而过，不留丝毫痕迹……

物理系的吴同学是福建莆田人，分到冶炼厂附近的红光小学，在戴帽子的初中班教物理。坐着公共汽车颠颠簸簸到山下，一下车就望见高耸入云冒着浓黄浓黑可怕烟雾的大烟囱，还闻到了呛人刺鼻的硫磺烟味……吴同学是北大物理系的高材生，教初中物理是小菜一碟，很快就在铜陵出名了。而后山下新办了个七中，吴同学又调七中教高中物理……过了好几年，吴同学与东方红小学的一位女教师恋爱了，打了结婚证后，他就把七中单身宿舍的行李一卷，坐着公共汽车背到山上东方红小学老婆的单身房间一放，就算结婚了，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1977年，吴同学回到北大物理系进修了两年。进修结业后，北京大学正式下调令到铜陵市教委，调吴同学到北京昌平北大分校任教。铜陵市教委死活不放人，当时市一中的书记校长捷足先登，多次跑到东方红小学吴同学家里，苦口婆心劝他留铜陵到一中。吴同学老实，最好说话，经不住一中领导的软磨硬缠，答应不去北大到一中了……从此，北京大学少了一个教授，铜陵一中多了一个特级教师……吴同学成了铜陵物理教师的第一块牌子，在一中当物理教研组长到退休。他的两个女儿考到北京留在北京，青春与知识献给了安徽铜陵的吴同学，老在了北京安度晚年，也算是当年没有回北大的一种遗憾的补偿吧。

中文系二年级的浦同学是苏州人，分到山下扫巴沟地区的江边小学戴帽子初中教语文。这个只有几排破平房的戴帽子小学，一边靠长江，一边紧挨冶炼厂的大片黑沙滩。进出学校，晴天灰沙飞扬，雨天一路泥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名城苏州与铜陵扫巴沟落差太大，浦同学满心沮丧，上完课就一个人闷在屋里叹气……浦同学住的教师单身宿舍一排平房，除了他一个男教师，一溜全是年轻的未婚女教师。一位桐城来的女老师看中了老老实实的浦同学，他是我们分到铜陵的北大同学中结婚最早的。这个北大学生落难时安在江边的小家，就成了老同学星期天聚会、聊天、混饭吃的好地方……

1978年，浦同学也调到了铜陵师专，在中文系教中国古代文学史。北大教授教古代文学一辈子只教一部分，如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浦同学在铜陵师专教古代文学，一个人从头教到尾，我们戏称他为“马拉松”教授……从大学到小学再到大学，浦同学到铜陵小城三十多年，一直到评上副教授到退休，他的心态似乎还停留在刚出大学校门刚走进社会的初始阶段，内向单纯，深居简出，除了老同学与亲戚，很少与外界三教九流交往，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很充实快活……

地质地理系的刘同学是江苏武进县人，分配到戴帽子的横港小学。刘同学在横港小学教过初中的数学、物理、化学、语文、英语，也教过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什么都教，成了一个全能教师。也许刘同学武进老家的村子与北大校长科学家周培源老家的村子，只隔一条小河，尽管历经文革磨难，刘同学没有放弃心中的科学家梦想。他不相信自己会一辈子当小学教师，每天晨起读英语，深夜攻读地质地理专业书，还写了好几篇地质地理学术论文，投进邮筒天天盼望回音……他一面苦读，一面跑专业对口，费尽周折，调到狮子山铜矿当了一名地质技

术员。那时，他正和横港小学的一位女教师谈恋爱，还住在横港。每天一大早从横港码头坐公交车到长江路，再从长江路坐车到狮矿，每天上山山下来回跑，好辛苦。有一天他坐公共汽车回横港，车到半路出故障了。车子还在朝前开，刘同学情急中砸碎车窗玻璃跳了车，受伤得了个脑震荡……有一天他看书到深夜，边看边吸烟，头脑昏昏沉沉，香烟火烧着了蚊帐，差点闯大祸……刘同学在横港那几年，真是多灾多难……

1977年，刘同学回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进修，两年后，作为第一批留学生，赴美国深造。先读地质硕士研究生，再读计算机博士研究生。留在铜陵小城的妻子女儿含辛茹苦，一家四口二十多年无法团圆。直到他在美国拿到绿卡，才把妻子与女儿接到美国团聚……

生物系的周同学是江苏人，分到第二冶炼厂筹建指挥部。本来他是到子弟学校当老师，因为是学生党员，被总指挥看中当了党委秘书，二冶投产后调硫酸车间当支部书记。他在江苏老家找了个老婆，匆匆结婚，匆匆调走，像路经铜陵的过客，一晃就不见踪影……

说起经济系的李同学，我真是欲哭无泪。我这个老同学太内向，太老实，精神压力也太大了。他是浙江人，本来也是分到狮矿子弟学校当老师，狮矿组织科长是浙江老乡，安排他到狮矿财务科当会计。李同学一天到晚不说一句话，老同学见面，他也只听不说。偶尔从狮矿到我这里来玩，他可以坐在我面前一个多小时不说一句话……突然有一天，传来一个叫人心惊肉跳的坏消息：李同学从狮矿铁架天桥上跳下来，自杀了！李同学怎么会自杀？这是公安部门的鉴定，深层次的原因谁也说不清。这个秘密李同学带到天堂去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分配到铜陵的十一个北大老五届学生，走了五个，死了两个，留在铜陵还有四个。另一个留在铜陵没走的，是北大地质地理系的倪同学。他也是浙江人，最早分在利辛县当农村教师，老同学帮忙调到铜陵，在铜官山铜矿机电科当电工。他到铜陵不久，就一声不响和师傅的女儿结婚了，老同学都不知道……同学见面有人说这好那好，倪同学总说“好个屁！”倪同学就得了个“老屁”的雅号……倪同学老屁很聪明，20世纪七十年代就会自己买配件装电视机、冰箱……第二冶炼厂投产后，他千方百计调到二冶机电科，从技术员做到工程师做到机电科副科长。金隆公司投产后，相中了这个怪才，选拔到工程部搞机电设备……倪同学到铜陵二三十年，没有大起大落，一直平平稳稳忙他的机电技术……

北大学生大多数都不会玩，倪同学又能干又能玩，退休前几年与退休后，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广场跳舞。你看他结实粗壮的身子，融入人群的翩翩舞姿，谁会相信他曾是清高的北大学生？恐怕连他自己都早已忘了那北大身分。是的，我们早就应该放下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了。北大学生在基层，你在方方面面做得好，世俗的人会说：到底是北大的，不简单！你做得不好，就有人会说：还是北大的呢，瞧这水平！人们总喜欢用北大的整体标准，来衡量北大学生的个人能力与水平，这悖论真叫人不可思议……唉，还是放弃北大的贵族意识，做一个平民，也许活得更快活更充实更轻松……

五

也许，现代社会的年轻人，对老五届大学生这个词汇很陌生。是的，老五届大学生是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很幸运，赶上新中国诞生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又很不幸，大学还没读完就遭遇“十年浩劫”，还一杆子被打落到社会最底层。最后他们还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几乎都评上了业务职称有了一定职务。比起“年轻时下放，中年时下岗”的一些老三届高中生初中生，他们的命运还不算太苦太惨。但老五届大学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断层中特别的群体与阶层，他们与20世纪六十年代以前的老大学生有共同语言，与21世纪的年轻人也能在观念与情感上沟通，老五届大学生是承前启后的一代知识分子。

可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与文学家艺术家，似乎都遗忘了老五届大学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今天，我写这篇文史散文，也算是对被中国当代文学遗忘的老五届文学的一个艺术补白吧。

□ 摘自《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

## 【抗拒遗忘】

孙历生和害死她的董光苔

• 于小康 •

### （一）孙历生的悲剧始于她 14 岁

小时候我曾抱怨妈妈孙历生乱说话成了右派。姐姐小红在“白花丁香树”里回忆妈妈，记得爸爸于光远后悔让妈妈去党校。而我责怪爸爸 57 年时流连东欧不回来保护妈妈。这些说法看法，其实都是童稚之言，不得要领。

孙历生是个热情的北平进步学生，14 岁加入共产党，也许对北京和平解放有微不足道的贡献，说不上功绩。那时北京市民心向共产党的很多，连我毫无政治倾向的姥姥姥爷都曾为被警察追捕的进步学生开过门打掩护。

像孙历生这样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向党交过血的投名状：你没为党整死过人，你凭什么说忠诚。她和党的短短缘分，是她在反右和文革中的遭遇的根源。因为毛泽东对地下党员在建国后的既定方针是：“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如果你是被逐步淘汰的对象，反右时人在不在党校，说什么不说什么话，丈夫在不在身边，有什么大关系？！而文革说到底，是“人民的幸福”来源于专政对象的痛苦。没有专政对象还得造出几个来，何况有过记录的右派，即使是错划的。

为什么他们要被淘汰？我没研究过党史，不会解释毛泽东的宏图大略。我只知道母亲孙历生所以是进步学生，是因为她有文化会独立思考，勇敢直率，向往自由。也许这些特性恰恰是她注定要被淘汰的原因。执掌中国的共产党，容不下孙历生。

### （二）董光苔害死孙历生

孙历生的死，直接的责任人是董光苔。1967 年初解放军“支左”部队由马营长领导进驻北京女三中，“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负责人是原女三中副书记董光苔。董光苔领导的女三中，继续了该校从红八月开始的整人打人的恶行，使女三中最终成了北京学校里的文革重灾区。在母亲非正常死亡的文革中期，女三中还逼死了另一个女老师方婷之，逼疯了一个男老师盛荃生。她迫害了大批教职员，有名的故事是体育教员孙瑞英被她打成“反革命”，仅仅因为她做针线活时把针插在毛主席像外的白纸边上。董也要间接地为一些老师家属的死亡负责。这样的人在文革后一直没失去权力，在清理三种人时安然无恙。只是由于她在女三中民怨太大，被调换了个地方后继续做领导。

董光苔已经死了。董光苔对我母亲之死的个人责任是不难推定的，即使不提及母亲有被“他杀”的巨大嫌疑。完全可以归责到董光苔的有非法关押，诬陷，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甚至有



人见证说孙历生当时解下来时尚有气息而董不许救治。可惜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收集控告董光苔的人证物证，追诉期过了。即使中国以后放宽对“反人类”罪行的追诉期，我们手里有再多证据也不能把董光苔拉进法庭当堂对质令她伏法了。

董光苔以“文革受害者”自居，以红八月受过迫害为由拒绝承认她害人的事实。在我看来，受过迫害并不能洗白一个人践踏他人生命的罪过；害过人，也不能成为被别人摧残凌辱的借口。这是一种“两不互相否定”吧。文革中发生的残酷迫害事件，只能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分析，在法律的基准上，聚焦在被害人的基本人权的被侵犯，聚焦在害人者反人类的行为。不要东拉西扯，混肴是非。

从反右到文革之前，妈妈的生活是痛苦的。即便不再被劳改，她也天天受精神折磨，写不完的检查交待不完的错误。那些直接间接明里暗里迫害她的人，在文革中也自己受到迫害。即使对这些人，我依然为他们悲惨的下场万分悲哀。无论如何，文明社会应该有一个“不能无法无天地践踏人的基本权力”的底线。

### （三）董光苔是特权和封建时代的产物

董光苔害人时已年过35，不是头脑冲昏的未成年人。和那时大多数中学老师校长不同，她不是普通家庭出来的知识青年，而有幸是她那个年龄段不多见的红二代，顶有烈士子女的光环。她的青少年经历据说很坎坷，曾在困窘中度过一段时间。1958年，周恩来安排她母亲来京和她团聚，确认了她母亲是董振堂的遗孀，给了她们住房。董在文革前已经是校长沙坪之下的女三中第二领导。

在文革中，董光苔得到了平民百姓没有的“可以活命”的私授特权。这个党和领袖特别开恩赐予她的特权，后来演变成她对别人生杀予夺的实际权力。她无节制地滥用她的权力向平民施虐，对施恩于她的权势表示忠诚，把一个小小的女三中搞成了人间地狱。她的烈士子女光环也使得她逃脱了文革后被追究手上平民鲜血的罪责。

孙历生不是董光苔唯一加害的人，但她和孙历生的恩怨反映了她的人品。女三中老教师们记得，母亲早年对董光苔多方照料，董受到孙历生的恩惠，举止就像她的跟班。母亲怀姐姐和我时，上下台阶董光苔都会主动地搀扶她。可是，1958年她们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母亲变成了右派，而董光苔的烈士子女身份却得到了确认。董光苔的身份改变以后，不仅仇视孙历生，也仇视其他知道她根底的老师。这种怨恨来源于一点：这些人知道她没有发达之前的窘态，因此他们都罪该万死。董光苔这样的人品在任何时代都不会是好人，而文革把对权力的所有制约取消，董光苔毫无顾忌地整人报复，给她治下的教师学生带来了梦魇。

我不放过董光苔，不接受她也有被迫害过因而是受害者可以不担责的开脱，不接受“人性本恶从来如此”的是非不分解释，不接受要受害人和施害者共同承担责任的胡言。董光苔害死孙历生有罪。给她无制约的权力来害人的权威有罪。

### （四）我逃脱了董光苔的魔掌

一个月前，我给北京市第七十七中学写了封感谢信，原因也和董光苔有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在北京景山学校四年级，那时才十岁。1967年底“复课闹革命”时，我应该上初中。因为父亲于光远被整，我没有回景山学校。女三中离姥姥家最近，也是孙家女儿们一向去的中学。按道理，我应该在那里上初一。那么，我就会在女三中里

亲眼看着母亲被斗争批判罚跪关押毒打。在董光苔的控制下，我很难想象我的遭遇是什么。幸运的是，有人帮助我去了离家很远的七十七中学而不是女三中。

我至今不知道我是如何逃脱董光苔的魔掌的。我写信给七十七中学，也是想揭开这个谜找到当年救了我的人。

（五）毛主席下旨，董光苔放生

在腥风血雨的红八月里，母亲孙历生和董光苔有短短时间共同被关在牛棚。和母亲这种庶民右派不同，董光苔有着特别的机遇。故事的很多细节是董光苔自己告诉文革研究者王友琴教授，后来被其他女三中老师们证实。我是小时候听我姥姥讲的，而她是从我妈妈处听说的。甚至有董光苔的远房亲戚发贴说过此事。细节虽有出入，故事梗概一样：在红八月里，董光苔和女三中十几个教职员一起被关押在学校多日。沙坪校长被打死以后，董光苔的母亲，烈士董振堂的遗孀贾玉明给毛主席写了信，通过解放军总政治部的关系，把信递了上去。由于这种特殊途径，毛泽东收到了信，并作了批示。批示是总政治部来人向女三中红卫兵开会传达的。董光苔因此从劳改队释放，并且很快被三结合了。

一个细节我没有搞清楚：放生董光苔具体是在红八月的哪一天。贾玉明找毛主席是在沙坪8月20日被打死之后。董家亲戚另外说是在董被关押在校七天之后。为什么我在意一个日期？因为我想知道在董光苔被放生之后，还有多少北京学校的教职员伤残死去。因为政府对这些人的死伤有无法脱逃责任，受害人和亲属有权要求政府赔偿。

董光苔的故事说明了三件事：第一，最高权力在那时知道有一批学校教职员在红卫兵手里，生命危在旦夕。第二，那时并不存在红卫兵“失控”的现象：解放军来个人开个会，人就放了。第三，放生董光苔，不放生其他人。不是不能救，是不想救。

想一想：成千上万的平民生命有危险，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是政府知道的，有能力有办法解救而刻意不救。这样的政府是什么政府？

政府领导人要负什么样的责任？这样的政府行为今天的人们能接受吗？如果47年前这样的行为今天不被批判而是被歌颂，是不是默许同样的行为再发生？

（六）向前看

虽然董光苔已死，我对清查没有水落石出的文革冤案和追究文革时的个人责任的态度并没有变。如果这仅仅是一家一户的恩怨，我可以放下。放不下是因为我认为反右和文革的谎言不被揭穿，可怕的根依然活着，不知道哪天又会发出邪恶的幼芽。反思反右和文革，就是为了往前走向前看，这是造福后代的大事。

□ 摘自《共识网》

【往事非烟】

北京男八中的一段往事

• 沈 宁 •

前几天，北京友人发来一份电邮，附件是陈小鲁发表迟到的道歉。读罢独坐良久，回想“文革”期间几次与红卫兵的奇怪遭遇，却是哭笑不得。

我和陈小鲁是北京男八中的同学，“文革”发生那年，他是高三，我是高二，教室在同一层楼，斜对门。可我们家庭出身不同，按照毛泽东的英明教导，隶属两个敌对阶级，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陈小鲁的父亲是共产党元帅陈毅，新四军军长，上海市长，外交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政治局委员。我的外祖父是国民党高官陶希圣，委员长侍从室组长，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蒋介石文胆。

因为家庭出身关系，我在学校十年一直努力装孙子，整日默不作声，低头来往，只希望老师同学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同时我也相信，外祖父名列毛泽东亲点的四十三名国民党大战犯，这般家世怎么也瞒不住。每年“十一”，男八中和女附中合组一个体育大军方阵，参加游行。从九月一日开学，两校男女生每天练队，十分辛苦。九月二十七日，专门选我生日那天，学校通知，我不能参加十一游行。全校独一份，再没有脑子，也都立刻知道我是什么人家子弟了。

陈小鲁那么聪明的人，自然心知肚明，所以“文革”发生之前，虽然每天上下课，我们在楼道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可只会相互点点头，几乎没有说过几句话。不过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从来没有觉得他架子大。他那时候嘴唇下面留点小胡子，每天骑个自行车，而且是辆很旧的破车。也从来没见过他穿过军装，永远是一身灰蓝色的普通制服，而且总把裤脚卷到腿肚子上，像个打鱼的，很好笑。

六六年六月，中国遭了劫。学校中厅贴出大字报，宣言成立红卫兵。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副对联，看得我心惊肉跳，只想找个地洞钻进去。可是红卫兵们暂时顾不得我，急着打倒当权派，校长温寒江和书记华锦。温校长剃了阴阳头，每天在校园里扫地。华锦书记受不了侮辱，在监禁室里自杀了，说是把裤带绑在门把手上勒死的。

我在学校虽然装孙子，可心里从来没有尊敬过老师，特别痛恨学校领导，他们天天喊叫阶级斗争，强迫学生吃忆苦饭，禁止我参加“十一”游行，批判过多少好人，坑害过多少无辜。我一直盼望有一天，他们自己也倒点霉，所以现在看到他们挨整，虽说不无同情，但也多少觉得高兴，尝尝挨整的滋味，看你们今后还整人不。

我们班里有好几个木樨地各军兵种司令部大院的子弟，旭东，进东，小晋，皖平，冀才等等。同学树东，因为家在西山军区，太远，平时住校。每周一和周六，苏制吉姆轿车开到校门口，勤务兵接送。当时吉姆车，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才能坐，可知其父军职有多高。这样的同学，自然都是男八中第一批红卫兵。也许他们有更要紧的军务在身，顾不得隐藏身边的阶级敌人狗崽子，我。整个“文革”期间，我在学校里没有挨过骂，没有挨过打，甚至没有遇见过红卫兵让我报出身。我也觉得奇怪，但说不出道理来。

要说红卫兵多少顾及一点同学情谊吧，有一次他们率领全体学生，赶往府右街，冲进一个院门，揪住一个女人，抡着铜头皮带，拼命毒打。我见旁边站个青年，像是高二的同学，抱着他的妹妹痛哭。我看不下去，溜走了。后来知道，那个同学再也没有来过学校，他的母亲被活活打死了，只因为她解放前做过舞女。对那个惨剧，对那个同学和他的母亲，我无限同情，一辈子也忘不了，更觉不能饶恕那些心狠手毒的红卫兵们。

破四旧开始后，我们学校红卫兵捉来宣武门的流氓集团紫锦队，在中厅里轮番毒打，说是练习如何打伤人内脏而外部不露痕迹。那天晚上，我从中厅走过，听见一个紫锦躲在楼梯下面哼叫。他被打伤，无法动弹。我看了，实在不忍，便关了电灯，把他扶出中厅，然后拿自行车，

推他离开学校。当时心里恐惧得要命，两腿发软。一个反动派狗崽子，救护一个流氓，被红卫兵抓到，两个定要一块打死。从此我就不敢到学校去，好在学校早已不再上课，没人管。

两个月后有一天，我悄悄到学校逛一趟，不想在中院碰见陈小鲁。他还是穿着灰蓝布衣，裤脚卷得老高，臂上没有红箍。他说：好久不见。我答：我不常来学校。爸爸妈妈都有病，在家休养，要我照顾。他说：过一个礼拜，红卫兵要在天安门集会，你也来参加。我说：我又不是红卫兵，红卫兵开会，我参加算怎么回事？他说：那天会有很多外地来的红卫兵，不懂规矩，出了事不好，我们北京的红卫兵要负责维持秩序。我说：我算干嘛的，去了找谁？没人会理我。他说：就说是我请你来的，有人问，让他们来找我。我是咱们学校革委会主任，我说了算。

既然人家这么看得起我，话说到这分上，我如果坚持不去，就太不识相了。于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我这个出身反革命大战犯的子弟，去了天安门，站在金水桥前。身后的红卫兵，看见毛主席登上城楼，胸膛鼓裂，泪流满面，挥舞手里的小红书，喉咙喊哑。我看着他们的模样，觉得又好笑又可怜，但我什么都不能表示。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见毛主席，胸膛里好像冻了一层冰，丝毫激动不起来。那个时刻让我来天安门，占去一个热爱毛主席的红卫兵的位置，真的不该。

“八一八”之后，由陈小鲁建议，成立起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男八中红卫兵自然是核心嫡系。也是老天不长眼，北京那么大的地盘，西纠偏偏到西四颁赏胡同的九三学社机关安营扎寨。我家住在颁赏胡同十三号外文出版局宿舍，刚巧跟九三学社斜对门，于是便成了西纠的邻居。院门外面墙上，贴满大字报，陶希圣和母亲姓名都倒写，打红叉。我们家人走在胡同里，邻居大人孩子指指点点的手指头，能在我们脊背戳出洞。可也许八中红卫兵老早知道我的家世，从来没有来找过我家什么麻烦。

西纠没顾上抄我家，可不知那里什么野鸡学校的红卫兵却突然打上门。我扶着腿残的母亲，躲出院子，隐身门洞，瑟瑟发抖。刚巧这时，一批西纠队员骑车到九三学社门口。我们班树东看见我，便问：你在这儿干吗？我不敢隐瞒，答说红卫兵正在抄我家。树东一听就火了：妈的，我们不抄，轮得到他们么？嘴里骂着，把车一摔，就往我家院里走。西纠里面我们班的大院子弟，也都丢了车，冲进院去。我闭住眼，心想这下子完了，非出人命不可。我们班那几位公子爷，天不怕地不怕，发起脾气来，真敢往人群里扔手榴弹。

还算好，没几分钟，刚才凶神恶煞来抄我家的那些红卫兵，垂头丧气走出院门，匆匆忙忙跑了。树东他们随后跟出来，对我说：别怕，以后再有人来抄你家，就过来找我们。我听了，心里很感动，连连点头道谢，扶着母亲回进院去。胡同里邻居们围着看见，都觉奇怪，怎么红卫兵西纠会保护国民党反动派的狗崽子呢？他们以后再欺负我们家人，还得留个心眼才是吧。

后来虽然各处红卫兵还是来抄了我家好几次，我也从来没敢真去找西纠求援。后来西纠离开了九三学社，树东他们都当兵走了。后来我们又搬到东单，再后来我到陕北插队，离开北京。可树东他们解救过我家一次，我终生不忘。到美国之后，我曾想方设法找到地址，给树东写过一封信致谢，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六六年底，红卫兵们都到外地串联去了，学校成了空巢，我大了胆子，时不时到学校观望一下。像我这样的反动派家庭出身，参加不了红卫兵，当然也没有外出串联的资格。有一天我去学校，碰见高二四班的红卫兵头目三猛和伯宏。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什么出身，却顺口问：你怎么还在学校，没出去串联？我无话可对，又不愿自报家门，便反问：你不是也还在学校？他们说已经出去串联过了，现在回来值班。然后又说：想出去玩玩吗？他们手里有大印，可以给我开介绍信。我说：出去玩，谁不想。

万没有想到，两位红卫兵头头二话不说，随手就给我开了个路条：我校同学沈宁，非黑五类出身，请沿途红卫兵接待站予以接待。北京八中革委会。然后盖上八中革委会大红印章，交到我手里。我看了，诚惶诚恐。我是非黑五类出身，我是黑五类都包括不下的最黑一类，国民党顶级战犯。可我什么话也没说，带了还读小学的妹妹，赶紧上路串联去了。

“文革”是中国空前（但愿能够）绝后的一大劫难，中国人民在“文革”中经受的苦难，怎么都记录不完。我家十年，历尽磨难，四分五裂，母亲被折磨致死。我对“文革”的愤恨，无以言述。但时隔近五十年，读到陈小鲁的道歉声明，回想起来，我与学校红卫兵的几次直接遭遇，却又真是非常奇怪，似乎于情于理，都难以成立。

我在学校没有挨打挨斗，已属非常。居然还被陈小鲁请去参加“八一八”天安门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可谓天方夜谭。人都说西纠是恶中最恶，可西纠确实赶走抄家红卫兵，救过我家一命，实出意外。而且八中红卫兵，竟然给我开路条，让我享受一次只有红卫兵们才能够享受的串联特权。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至今说不清楚，只好把这几件事记录下来，也算一段历史。

□ 摘自《随笔》2013年第6期

~~~~~  
【不堪回首】

红卫兵留在我身上的印记

• 彭 古 •

我年逾古稀，肩背上的斑斑鞭痕，时常勾起我痛苦的回忆。40年前，那恐怖的1968年，即“文革”第3年，那场噩梦，使我心惊肉跳！我差点被学生活活打死！

一天，本校红卫兵谢仲光率其兄等三人，突然闯进我的家，不由分说，抓捕我回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事后，据知内情者透露，他们已作好部署，半路上要把我掐死弃尸河里。那时，湖南省道县的大屠杀风已刮至我们娄底地区，河里经常浮现尸首，杀人像杀鸡一样简单，一片红色恐怖！为防不测，我的家人一路上护送，使他们不敢下手。

我被关押在村监狱里，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关在一起。村里戒严，村头路口，有民兵把守。谢仲光是高二年级学生，我教他语文，和我同村，他家是贫农，我家是地主。在当时“红五类”、“黑五类”阶级对立的社会气氛中，他视我为仇敌；加之因他学习懒散，我曾对他有过劝告和批评，他对我更加怀恨在心。“文革”中挨过老师批评的学生，借机报复，打老师是常事。谢仲光贴了我不少大字报，批斗过我好几回了，现今又率人抓捕我，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一天晚上，谢仲光 and 同班同学彭金连，把我从监狱里提出来，在晒谷场上痛打了一顿。用鞭子抽，落手很重。他俩边打边骂，折腾得村里人都知道，可是，没有人来围观，乡亲们都同情我，不支持学生打老师。但那时红卫兵横行一时，谁也不敢来保护我。有人暗地告我，今晚只是杀威棒，大的武斗还在后面，极其恐怖。

灾难果然降临了，会场设在大队部，主席台上贴着“斗争大会”四个粗体黑字。谢仲光和彭金连等人，剥光我的上衣，把我按倒在地。军用皮带的铁头，雨点似的抽在我的头上肩上手臂上，他俩边打边号叫，控诉我的罪恶。贫协主任刘申甫大伯，看不过意了，走上台来，用手

臂替我左遮右挡，挨了不少皮鞭。他还不停地说：他是老师，不要打了。我用双手死死护住脑袋，鲜血从手臂往下滴。

台下的乡亲们喊起口号来，而且不停地喊，都是有关“文革”的口号，诸如“打倒刘少奇”“文革万岁”之类。一喊口号，打人者要跟着喊，武斗就暂停。一开打，口号声又起，实际上起着保护的作用。他们俩打累了，厉声高叫“彭小莲上台来打！”台下没有回应，一片沉默。村里在二中上学的有三人，彭小莲，高三女生，不赞成打老师，几次呼喊，她都不予理睬。我感谢这位学生的理智，不加害老师，在那样的场合，是多么的可贵！

这时，台下乡亲中有人小声议论起来：“徒弟打师傅，过河打渡子”，可就是没人敢出头来制止武斗。谢仲光和其兄，全然不顾舆论，百倍地疯狂，扬起早已备好的荆棘把抽打，在我身上划出一道道血口。我疼痛难忍，往桌椅下躲，被他们揪出来摔在地上，继续受刑。乡亲们见状，振臂呼喊口号，不停地呼，接着唱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这支歌来。“文革”开会，唱这支歌就意味着散会。于是武斗终止，我被送进监房，肩背被打得稀烂，俯卧于地，动弹不得。

不久，47军进驻湖南省“支左”，制止武斗和屠杀，取缔群众组织私设的牢房，事态才逐渐平息。我在村牢房的半月“再教育”也告结束。国庆节那天，谢仲光“陪送”我回校。一路上，喇叭里播放着语录歌，我心里在流血！

“老师，我不喜欢语录歌”，谢仲光对我说，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又叫起“老师”来了。我望着他苦笑一声，身上的伤口还在渗血，心想你下手太重了！但他还是孩子，看来对我并无刻骨的仇恨，是“文革”狂热在煽动他，毒害他，使他失去了良心。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歌呢？”我问道。

“抒情的”，随即他断断续续哼了几句。他唱的是《马儿呀你慢些走》，当时是属禁唱的黄色歌曲，唱这支歌与当时的氛围很不协调。既然他喜欢，我强忍着鞭痛，轻声地领他哼，纠正了他唱错的几处。两人沉浸在歌曲优美的旋律中，忘却了彼此不应有的仇恨。

“没见过青山滴翠美如画，人在画中闹丰收，万绿丛中有新村，槟榔树下有竹楼……马儿呀你慢些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

哼着，哼着，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优美的画图，祖国美丽的前景，野蛮血腥的一幕似乎没有发生。谢仲光虽说干下了凶恶残暴之事，但他有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可见其良心并没有泯灭，也是个“文革”的受害者。

数年后，我调省城长沙工作，想不到在长沙街头，我与谢仲光邂逅，两人微笑着点点头，擦肩而过，没有交谈。他当兵了，穿着军服。往事如过眼烟云，在他心头肯定不会留下什么印象，淡忘了；我刻骨铭心，身上的鞭痕似乎还在隐隐作痛！

10年后，我从长沙奔丧回家，在娄底火车站，我与谢仲光再次邂逅。一个中年人走上前来，亲切地叫我老师，和我握手。我已老眼晕花，良久，认不出来。“老师，您忘记了，我叫谢仲光，是您的学生。”啊，我想起起来了。他人到中年发福了，完全不像以前的样子。我激动地握着他的手，说不出话来。他也仔细地端详我，把妻子儿女介绍给我，要女儿叫我爷爷。他转业在广州工作。他成熟了，问我的工作，问我的身体。我避而不谈往事，我们之间早就没有了仇恨，此时唯有师生情谊充溢胸怀。

又10年后，我年逾古稀，回乡下老家省亲，路过谢仲光家的老屋，只见一片废墟，房屋被人拆除，宅基地上长满野草，一派破败的景象。乡亲们告诉我，谢仲光去世了，这几年他的父亲哥哥妹妹都相继去世。听后，一丝悲凉袭上心头！谢仲光，只50出头，英年早逝，可惜！真是人生在世，盛衰难料，善恶好自为之呀！

我身上的斑斑鞭痕，是红卫兵运动刻下的印记。红卫兵摧残的何止一个小小的我，有多少达官贵人被冲击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能留下一条小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我们怎能去责怪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呢，但愿当年的红卫兵都能醒悟，永远记住我们国家民族的那页灾难史！

（作者为长沙外国语学校教师）

~~~~~

##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十七）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967.6—1968.9））

### 第二十章 “联合总部”，联而难合

1967年9月15日，毛泽东发布了最新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要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这犹如一股强大的春风吹进清华园。都自称最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团四两派没有任何理由不积极响应。

对于这次联合，蒯大富是作了认真努力的。他首先放弃了鸵鸟政策，明确承认414总部是一个合法的群众组织。这一点，对我们来说，他只是改错。蒯大富做事，一向以功利导向。上次为了成立革委会而承认“414串联会”，这次为了大联合而承认414总部。能改正错误，比坚持错误要好，还是值得肯定的。他率领兵团总部委员到414总部所在地与414总部委员一起学习最高指示。这是一个友好的高姿态。在“联合总部”核心组的名额分配上，他从《四项协议》那个时候的9：4往后退了一大步，认可了基本对等。这是一个关键的、实质性的让步。应该讲，蒯大富能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可能，他对他的总部委员特别是持鹰派立场的强硬派，除了说服以外，也用他的权威进行了压服。因为这实质性的让步，已经超过不少团派总部委员可接受的底线，触及了团派的核心利益。尽管蒯大富心里可能也是打着“先联合你、再整治你”的小算盘，但是他为了实现两派的大联合，为了实现他有点过于乐观的“一定在‘十一’前成立革委会”的目标，他的这些举措体现了他这一时的政治远见，于大局是有利的。

414得到的这些实际成果，虽是414近半年努力争取的结果，也是团派做了极大让步的结果。说句公道话，414在这次联合中并没有实质性的退让或损失。虽然414中有些人并没有放弃“以414为主”目标，但是“以414为主”只是单方面的美好愿景，并不是切合实际的行动目标。414总部对基本对等的结果是很满意或比较满意的。

9月21日，两派签署了联合协议，发表了《总勤务站公告001号》，标志着两派的联合跨出了艰难的第一步。谢富治、傅崇碧都给清华的大联合题了词。我认为团派为大联合的初步实现比414作出了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但是，很遗憾，这次大联合，最后还是功亏一篑，以失败而告终。这其中的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

应该承认，联合的思想基础是十分薄弱的。因此，本来双方都应十分用心的爱惜维护这颗弱小的幼苗。一个很细小的偶发事件都有可能把千辛万苦培育出来的幼苗扼杀在嫩芽状态。要尽量做到不说不利于联合的话，不做不利于联合的事。

联合后的总部叫“总勤务站”，这是双方协商后都同意的，并且以此名称发表了公告。但是4 1 4中的激进分子对“总勤务站”的名称严重不满，认为有让外人误解4 1 4是被团派“吃掉”了的嫌疑。沈如槐屈从于派内压力，在全校大联合庆祝大会前向蒯大富提出更名为“联合总部”的强烈要求。这反映了4 1 4的不识大体、没有全局观和小心眼。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团派群众普遍的强烈抗议，认为是4 1 4又一次撕毁了协议。多数4 1 4群众也认为临时更名没多大必要，得不偿失，事后纷纷用大字报提出批评。沈如槐当时也认识到“会前临时要求改名，纯粹是出尔反尔的小人之举。由于改名风波，两派大联合的气氛已经荡然无存。在这个问题上，我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我仍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后悔不已。”改名风波引发的对立情绪把前些天好不容易才培养出来的一点联合氛围冲淡了，冲散了。此外，4 1 4在“对等原则”下谈判下属机构合并时所表现出来的斤斤计较，也是不够明智的。

两派中都有观点比较激进的一些人。虽然这部分人数不多，但都是派内骨干，能量极大，特别有煽动力。作为一把手，应该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尽量调和派中从激进到温和的各种意见，不可太偏重极端的一方。在这点上，我甚至觉得蒯大富搞平衡的手腕比沈如槐要更高一些。

譬如，10月3日，团派激进的“6 2 4战团”变身为“斗私批修联络站”，其用意是斗蒯大富的“私”，批4 1 4的“修”。第二天，蒯大富写下了“伟大的空话，动人的口号，美丽的外衣，装着一个丑恶的小资产阶级灵魂。惊人的毅力，聪明的才智，僵化的脑袋，面临着暗淡而可怕的前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革命到底的，总是有极少数人摔出去，我们队伍中不见得全是好人”。他以软中带硬的口气与团派内的激进分子“共勉”之。这说明蒯大富当时的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对派内的鹰派也是敢于批评、努力节制的。我很少见到沈如槐有这样的批评和节制。

在“联合总部”的名义下，两派共同组织了庆国庆、下乡三秋、复课闹革命等活动。这些活动的特点都是不涉及两派分歧，是无派性的公共活动。这一些活动，有利于两派关系的融洽，有利于团四群众隔阂的消除，也有利于增添联合的气氛。

但是，一旦涉及到两派的分歧，派性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联合总部”成立干部学习班，在干部人选上发生争执。4 1 4坚持把吕应中、罗征启放进来，团派坚决不同意。”“联合总部”公布的总部委员中（由蒯大富、沈如槐、孙怒涛、鲍长康、宿长忠、刘才堂、汲鹏、刘万章等3 3人组成）有谭浩强，一部分团派的激进分子也坚决抵制。在干部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本来就很大，都认为这是自己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肯妥协和让步，于是争执不断。

在联合的过程中各种干扰也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一个干扰是周泉缨接连炮打陈伯达增添了联合过程中的火药味。团派与4 1 4的大多数要批周泉缨，“东方红战团”要保周泉缨。于是，这一新的焦点既涉及到两派的派性利益又似乎不完全是以团四分野的纷争。

此外，我认为作为“联合总部”一把手的蒯大富，对“联合总部”的领导不够得力没有到位。蒯大富始终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团派一把手而不是“联合总部”的一把手。初步联合一个半月后，即11月8日才公布“联合总部”的总部委员名单。团派和4 1 4两个总部下各办事



机构的联合和合并，举步维艰，没有强力推进。大多数的部门没有合并起来。“联合总部”仅仅是一个空架子，实际运行的仍然是团总部和414总部。初步联合后，两派没有制定出实现大联合、成立革委会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而是走一步看一步，走到哪就算哪，头头和群众都是心中无数。很可能，我是苛求蒯大富了，他可能有我所不知道的难处。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没有很好利用9月底10月初的大好时机趁热打铁，联合的机会就这样在这两个多月中销蚀掉了。到了12月4日，团派绑架了吕应中，12月20日，团派绑架了陈楚三。这两起绑架事件，宣告“联合总部”名不存实已亡，这次联合最终失败。

这次大联合的失败，我认为主要责任不在上层，而是在两派本身，因为上层并没有响起有负面作用的不同声音。两派的分歧是深刻的，两派的派性是严重的，两派在处理联合中出现的问题都有不少的错误。在联合的开始阶段，团派的诚意和努力都是显著的，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一些。最后团派策划的两次绑架，给苟延残喘的“联合总部”以致命的一击。所以，在大联合的最后失败上，团派应负主要的责任。

我不会成为两派大联合的阻力。但是，要作为积极的推力，我的努力显然是做得很不够的。

## 第二十一节 414战歌林彪语录真伪之争，一场惊动中央高层的闹剧

414有一首战歌。围绕着这首战歌，不仅两派打得不可开交，还把好几位中央首长都牵连进来了。

战歌是在“414串联会”成立后大概5月份唱响的。歌词用的是林彪的一段语录，414自己谱的曲。歌词是这样的：“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嗨！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决心今天就死，就死在战场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说实在的，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对这段歌词的感觉不是很舒服。主要是那几句重复的“完蛋就完蛋”，觉得比较粗鲁，有点兵痞气。可能想要表达的也是革命英雄主义，但是总不如像“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那样的毛主席语录来得威武、正气。要让我来选择，我肯定不会选林彪这段语录做414战歌的歌词。

不过一想到这是林副统帅的语录，我就无语了。想想也是，在战场上，看到自己的战士流血牺牲，杀红了眼，什么糙话都可能会说的，顾不得粗鲁不粗鲁了。

文革初期，流传过毛泽东的好几首未公开发表的诗词。其中有一首叫《念奴娇·鸟儿问答》，里面有一句是“不须放屁，试看天翻地覆”。

不雅的甚至可以说是污秽的“屁”字一旦入了领袖的诗文，谁敢说臭？谁敢说不雅？报纸上的吹捧文章说那是伟大领袖在抒发豪情满怀的革命情操。中央级的文艺团体在恢弘的舞台上齐声合唱用这首诗谱的歌曲，堂而皇之地把“屁”字唱得震天响。

统帅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么副统帅的话少说也得一句顶八千句吧？总之，歌词是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抒发还是流氓无产者亡命一搏的宣泄，并不取决于歌词本身而是看谁说的。只要是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语录，谁敢说半个不字？

开始我觉得不是很顺耳，唱的次数多了，慢慢的就顺耳了，甚至悦耳了。414集会时唱，

游行时唱，广播台更是每天播唱。在派战中，唱这样的战歌就像打了鸡血针似的，特别能鼓舞斗志，激励士气。派性催生派歌，派歌益增派性。

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是谁最先发现这段林彪语录。沈如槐、周泉纓的回忆文章里，两人的说法有点出入。不管怎么说，周泉纓很欣赏这段语录，在4 1 4战歌形成的过程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周泉纓说，选中这段语录是因为它是“一贴良剂”，有助于“克服4 1 4派在文革中固有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 1 4派对团派的战斗力。”

4 1 4派中，“东方红战团”对团派向来是观点鲜明、态度强硬、立场坚定、毫不妥协，已经很“亢奋”了。“温良恭俭让”的弱点是“三七战团”带来的。所以我把周泉纓的这句话翻译一下，其含义就是：4 1 4战歌有助于克服4 1 4派因为“三七战团”而带来的温良恭俭让的弱点，从而不断增强4 1 4派对团派的派性战斗力。

团派有自己的团歌。第一句是“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旋律像是颂歌似的，比起4 1 4战歌的高亢激昂、杀气腾腾来，反倒显出几分温和味。林彪这段语录透出的“兵痞”气与团派某些人的“民痞”气，倒是很相通的。怪不得团派里有人认为这段林彪语录与团派的气质特别吻合，应该是团派的战歌才是。现在竟然成了4 1 4的战歌，阴差阳错，莫不表示极大的遗憾。

派性是怎样炼成的？派性就是这样炼成的！

团派对这首4 1 4战歌恨得咬牙切齿，把他称为“完蛋歌”。4 1 4不予理睬，你骂你的街，我唱我的歌。4 1 4广播台的高音喇叭也是响彻全校、无孔不入的。夜深时分，战歌一响，老团躲在被窝里直骂娘，老四躲在被窝里偷着乐。好几个月，就这样过来了。

突然有一天，那是1967年的12月5日，团派广播台发表严正声明，称4 1 4战歌的歌词不是林彪语录，4 1 4造林副主席的谣、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还说4 1 4战歌用的是法西斯语言，宣扬的是武士道精神，曲调是豺狼般的嚎叫。总之，最歹毒的话都说了个遍。

在这之前没有一点征兆，突然之间从天上掉下来那么吓人的罪名。蒯大富有虚张声势的前科，4 1 4早就领教过多次了。不理他！4 1 4依旧我行我素，战歌照唱不误。

12月13日，蒯大富发表公开讲话，说他请示了周总理，周总理要空军司令、林彪的老部下吴法宪核实是不是林彪语录。吴法宪回应说：“林副统帅没有讲过那段话，肯定没有讲过，也不会那样讲。”于是蒯说，如果再唱这首完蛋歌，就是明目张胆地炮打林副主席的反革命！蒯大富经过周密策划、精心密谋，动用了高层大人物的力量来打击4 1 4嚣张气焰的这场战役，看来是胸有成竹、胜卷稳操了。

蒯大富的这一番话，打了4 1 4一记闷棍。吴法宪言之凿凿而又无法证实的这番话让4 1 4陷入极度被动之中。认输不唱是不甘心的。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出铁证来证明4 1 4战歌的歌词确实是林彪语录。

4 1 4里也有不少高干子弟。他们纷纷出动，寻找这段语录的权威出处。很快，找到了。4 1 4心里有底了。12月16日，4 1 4广播台发表了一则声明，重申歌词是林副统帅的语录，但没公布语录的出处。4 1 4使了一个欲擒故纵之计，这套虚虚实实的手法是想让蒯大富

暴露得更充分些。

学校里的蒯大富还没来得及对414的声明做出反应，谢富治、戚本禹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为蒯大富助阵撑腰来了。“谢富治说：‘我从未听说过，谣言。’戚本禹说：‘造毛主席、林副主席谣的人，罪该万死！’”

至此，起码已有吴法宪、谢富治、戚本禹三位大人物对林彪语录表态，明确站在蒯大富一边了。

414看时机已到，于12月18日在大礼堂召开战歌问题专题大会。这次大会由我主持，陈楚三做主题讲话。他在讲话中不仅公开批评了前两天谢富治、戚本禹的讲话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更激动地宣布了414战歌歌词所用语录的原始出处。原来它出自林彪1959年11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收录在总参谋部编的《林彪元帅有关战役方面的论述汇编》。

总部在讨论开这个大会的时候，一致认为由陈楚三来宣布这一证据，比其他任何头头来宣布更有权威性、更可信。

当大礼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的老四一听到这一宣布，立时掌声雷动，欢呼雀跃，几乎把大礼堂的圆屋顶都要掀翻了，几天来一直压在心头的沉闷憋屈一扫而光。

团派宣布战歌绝不是林彪语录，犹如一颗“炸弹”炸晕了414。现在414回敬了一颗威力更大的重磅“炸弹”给团派，绝对把团派炸懵了！414很得意。事态的发展似乎是在这一回合派战中，团派只能悄然认输，偃旗息鼓，而414可以大获全胜，得胜回朝了。

还没等到414好好地庆贺胜利，品尝胜果呢，形势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急剧直下。

刚过了一天多，即12月20日，中午时分，我正在九饭厅吃饭。刚吃了一半，突然，从门外跑进一个姓谢的女同学，找到我，对我说：“老孙，不好了，老团把陈楚三给抓起来了！”

什么？抓了陈楚三？我大吃一惊！张着嘴，含在口里的一口饭堵在喉咙口下不去。我撂下还没吃完的半碗饭，心急火燎地跟着她一溜小跑到414广播台。此时科学馆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议论纷纷，吵吵嚷嚷。我知道了陈楚三是在照澜院食堂用餐时被团派用小汽车绑架走的。

在我以往的印象和判断中，团派恨“东方红战团”胜过恨“三七战团”。在“东方红战团”的头头中，当然对沈如槐最恨。对陈楚三，尽管也很恨，但是我以为在414所有头头中，团派最不敢动的就是陈楚三，因为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康生的“养子”。蒯大富即使想动414的头头，也绝对不敢动到陈楚三的头上。

为什么要抓陈楚三？可能是因为这一年来的派战中，陈楚三始终坚定地抵抗团派的“旧仇”，再添上前天陈楚三宣布战歌是林彪语录的“新恨”，老蒯对陈楚三真的下手了。这是我的猜测。

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都弄不明白蒯大富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为了达到什么目的非要把陈楚三抓起来扭送到北京市公安局不可。据鲍长康多年后对我说，抓陈楚三这件事并没有在总部会议上讨论研究过。看来，这是蒯大富与保卫组等人商量后就决定干的。这一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是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

非理性的、疯狂的、不计后果的，不仅仅只是蒯大富，还有我。就在我到达科学馆不久，听得团派广播台广播了将在大礼堂召开斗争反革命分子陈楚三大会的通知。我一听急了，手足无措，方寸大乱。有人说，沈如槐在中央主楼的一间房子里，因怕被团派把他也绑架走，被身边的人劝阻着不让出来。科学馆里只有我和宿长忠两个头头。我与他商量以后，用大喇叭把全校的414召集到西大操场。因为事出仓促，来到西大操场的老四都是非建制的散兵游勇。我除了讲陈楚三被团派绑架以外，也讲不出更多可以鼓动的话了。来多少人算多少人。分派一部分人去大礼堂捣乱团派开大会，一部分人去包围团广播台不让团派专心斗陈楚三。我就这样胡乱地脑袋一怕，调兵遣将。结果，除了造成冲突以外，毫无点滴建树，倒尽显一个书呆子头头在面临突发大事时的笨拙和慌张。

陈楚三被绑架一事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而清晰的信息：如果蒯大富连陈楚三都敢抓，那么414里所有的干部、群众，尤其是414头头，没有一个人是他不敢抓的，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414是这样的一个群众组织：像周泉纓引爆的内乱很可能让414四分五裂，内讧不断；而蒯大富，甚至是中央文革的横蛮高压只能使得414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

这次陈楚三被抓事件对414的正面效果是，因《必胜》争吵造成“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之间的巨大裂痕得到了有效的修复。我想，沈如槐一定也与我一样更明白了，“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谁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只有精诚团结，减少或者搁置分歧，才能在险恶的大风大浪中让414走得更远些，更久些。

陈楚三不只是“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更是414的核心头头。在援救陈楚三的问题上，我和“三七战团”没有二话，唯有全力以赴。

冷静下来以后，总部认真研究形势，认为只有上街游行，把事情闹大，让中央知道，才有可能解救陈楚三。

12月21日上午，414组织了1500多人的队伍进城游行，向社会公布战歌事件的真相，诉说陈楚三被抓的冤情，争取輿情的支持，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陈楚三。同时，还质问北京市公安局究竟是谁同意抓了陈楚三。我们想以此惊动更高层领导关注这一事件。“在出发前的动员会上，刘万章说：‘如果陈楚三是反革命，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我们与陈楚三共存亡。’宿长忠谴责‘蒯大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清华园一片白色恐怖。’孙怒涛高呼说：‘还我人生安全！还我‘四大’自由！’”

游行队伍在北京市革委会前举行了集会。集会后，在队伍要不要留下来静坐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原来在头天晚上总部核心组开会的时候曾经做过决议：如果上面不立即释放陈楚三，游行队伍就不回校，静坐到底。真到要执行总部决议的时候，不少分部头头及许多骨干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这样孤注一掷的做法是不是策略？学校里的运动还要不要继续搞？已近隆冬，这一千多人的队伍的后勤供应怎么保障？等等。我与汲鹏倾向于先把队伍拉回学校再说。与沈如槐、陈楚三、宿长忠关系极好的张雪梅，出于尽快救出陈楚三的焦急心态，对我这样的“退缩”态度很不满。沈如槐有心想坚持静坐，但从全局考虑，也看到大多数的人不想留下来，决定大部分回校，一小部分留下。因为陈楚三是数力系的又是分管广播台的总部委员，所以自愿留下的三四十名老四也多是数力系或广播台的。他们由总部委员张雪梅和数力系分部一把手周忠荣（当年曾叫周忠东）负责，赶往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来访接待室，办起了“革命到底学习班”，目的是要查清绑架陈楚三的真相，要求立即释放陈楚三。

不清楚是不是4 1 4声势浩大的游行真的惊动了中央的更高层还是另有原因，反正是才过了几天，事情出乎意外地发生了转机。1 2月2 6日是毛泽东的诞生纪念日。那晚，4 1 4正在西大饭厅举办“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庆祝晚会。九时许，突然接到中央首长接见的通知。戚本禹、谢富治还有北京市的领导丁国钰、李钟奇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我们。

先单独接见团派，再单独接见4 1 4，然后两派一起接见。

在接见4 1 4的时候，陈楚三被架着出来，放回到我们中间，意思是说放人了。才几天不见，本来温文尔雅白净斯文的陈楚三，脸上带着伤痕，尽显受尽折磨挨打以后的疲惫。我们立即涌上前去，围着他，如劫后重逢，格外的亲热。

已经知道这段语录是林彪的，已经知道抓陈楚三抓错了，说不定因此还被更高层批评了几句。即便如此，戚本禹张狂的本性丝毫没变。在接见会场，我们与他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他一再狡辩，说“你们的战歌也是有问题的嘛！曲调不够高昂，也不够严肃……‘完蛋就完蛋’多了么，怎么那么多？……反复也不行。说的严重些，这实际上就是篡改。……起码是不妥当、不严肃。”当我们说到我们的战歌是比较好的，比较好听，我们很受鼓舞，戚本禹问：“你们谁来唱一唱？”我们八位代表再加上陈楚三，蹭的一下全站起来，昂着头挺着胸，齐声唱了起来。尽管我们这几个大小伙子五音不全，但是声音绝对响亮，几乎是对着戚本禹在吼叫，恨不得把他的耳膜震聋！

在同时接见两派的时候，戚本禹不敢再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了，他照本宣科地念了预先准备好书面稿。他不得不承认“4 1 4的同志们把林彪同志论述我军战斗作风的思想改编为战歌，这是热爱林副统帅的表现。但是……”，戚本禹在“但是”后面又开始大做文章了！他“但是”道：“这个改编没有把林彪同志论述八大作风全部表现出来，同时也没有把林彪同志的我军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作风的话引全，而且在两派闹派别斗争时，用这个战歌来鼓舞士气，这就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林彪同志伟大的军事著作是不妥当的。此外，战歌的曲调也不够高昂……”

看着这毫无自我批评精神、鸡蛋里挑骨头、无理搅三分、满嘴胡喷的戚本禹，我心里极度的厌恶和鄙视。心想，像他这样没有教养连狡辩都没水平的无赖，怎么就混成“中央首长”了呢？

还有可气的是，就在接见会场，团派代表看到陈楚三在场，对着我们大声叫嚷“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说，“抓起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放出来是实行群众专政！”我们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中央首长明确表态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但是谢富治、戚本禹对我们的抗议置之不理，只说“陈楚三出来了就是了嘛”，绝口不提“无罪释放”。这使我们感到，战歌事件其实还没有完全结束，还留有尾巴。团派只是输了一个回合而已，它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1 2月2 7日黎明时分，我们回到学校，马上组织欢迎陈楚三胜利归来的群众大会。从南校门直到大礼堂，七千多名老四列队夹道欢迎陈楚三。尤其在大礼堂的过道上，人们簇拥着陈楚三向台上走去。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如欢迎钢铁英雄凯旋归来。对4 1 4来说，他们不得不释放陈楚三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陈楚三被释放了，本来驻扎在北京市公安局里的“革命到底学习班”也可以撤离回校了。可是，释放当天中午，团派有十几名总部委员发表联合声明，说陈楚三就是反革命。蒯大富也发表讲话，说“权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抓就抓，想放就放。我们想什么时候抓他，就什么时候

抓。”想到陈楚三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抓走，又不清不楚地被放回，觉得事情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要不，遗患无穷。总部与“革命到底学习班”商量以后决定，一定要为陈楚三讨一个公道，也为4 1 4讨个公道，这个学习班还是要坚持办下去。

这以后，“革命到底学习班”由周忠荣负责。

总部委员都到过“革命到底学习班”，我也那里住过二天。我发现他们与公安局工作人员的关系很不错，彼此能平和相处。这很不简单。因为在北京市一般民众的眼里，既然4 1 4是蒯大富的对立面，那4 1 4肯定是保守的，不被中央支持的。尤其是公安系统，是谢富治一手把持的地盘。要在公安局门口的接待室里和平申诉，万一有点过激的言语或行为，马上扣个“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帽子，吃不了兜着走。周忠荣他们白天学习、开会、写大字报、找公安局的同志申诉和询问，晚上铺点东西和衣而睡，还有雷打不动的“早请示、晚汇报”等活动。这二三十位老四都在为陈楚三被抓一事讨个公道做出了极大努力。其中有位姓薛的女教师一直坚持了两个多月，令人感动。我对这批“东方红战团”骨干的精诚团结，对周忠荣的奋勇带头和出色能力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让我惊羨不已。陈楚三能有这批生死之交，不枉为挨了一顿拳打脚踢，坐了几天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禁闭。

“革命到底学习班”在北京市公安局群众接待室坚守了9 5天。他们要求追究抓人关人的责任人，矛头直指蒯大富、谢富治，同时要求为陈楚三彻底平反。在蒯大富、谢富治大紫大红的时候，这些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

1 9 6 8年2月份，首都高校学习班开张。学习班负责人李钟奇、丁国钰批评4 1 4至今还有人进驻在北京市公安局里，是破坏大联合的气氛。沈如槐和我这些参加学习班的头头感到压力很重，劝说“革命到底学习班”撤离。他们不听，反把我们这些头头训了一顿，说我们太软弱。连沈如槐都劝不动他们，我的话当然就更没分量了。

2月中，戚本禹倒台。4 1 4上下欢声雷动。这本来是一个顺坡下台的好机会。总部作出决议命他们撤回学校。但当时社会上有一股倒谢富治的风潮，他们认为那里是一块很好的宣传阵地，想再看一看，还是不肯撤回。

到3月2 4日，杨、余、傅倒台了，而谢富治反倒岿然不动。他们这才撤回学校。

对于这批“东方红战团”的骨干，我既钦佩他们的执着，也恼火他们有时候的固执。

在4 1 4头头中，被团派扭送进公安机关的，前有周泉纓，后有陈楚三。因为周泉纓的《炮打》在4 1 4群众和总部里都是不得人心的，认为他的炮打行为是伤害4 1 4整体利益的个人英雄主义行为。所以，他被扭送进去以后，4 1 4总部并没有对他有营救的举动。相反，在底下里，我听到过说他是自己想当反革命、是咎由自取的议论。陈楚三被团派绑架至公安局，大家一致认为陈楚三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也是为了4 1 4整体利益而受迫害的。所以4 1 4上下一气，誓把陈楚三营救出来。对他们俩被抓时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了尽管在派性年代，4 1 4的每个人心里都是有一杆秤的。

在没经历过文革年代的后人看来，战歌事件简直是一场闹剧。我现在回头看看，确实是闹剧。4 1 4拿林彪语录当做派歌是闹剧。团派攻击4 1 4伪造林彪语录是闹剧。4 1 4反击团派恶毒攻击林副统帅也是闹剧。一段话，要是领袖语录，那谱曲传唱就是热爱领袖的表现，否定这段语录就是恶毒攻击领袖。若不是领袖语录而当作领袖语录，那就是篡改领袖语录，罪该万死。至于这段语录，内容是不是正确、健康、有品位，那是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在

这样的评判标准下互相攻讦，更是闹剧。如果只是打口水仗，骂来骂去，还只是小闹剧。最后竟然把陈楚三给绑架了，最后公安机关竟然把陈楚三收监了，最后把多名中央要员都牵连了进去，这更是大闹剧。

一场闹剧，折射出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荒诞！

在战歌事件中，可以看到团派和 4 1 4 都是派性大发作，很难说得清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但是从团派绑架陈楚三开始，虽然 4 1 4 救援陈楚三的行动中有很大的派性考量，但是谁能否认得了这是对蒯大富任意剥夺人身自由（他这时有没有想起一年多前他被工作组无理地剥夺了人身自由？）、对谢富治践踏法纪草菅人命、对戚本禹信口雌黄胡说八道的正当抗争？

经历战歌事件，我感觉到我们的人身安全没有一点保证，随时都有被抓捕被绑架的危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感到害怕。因为，我的背后有一个很团结的、很强大的组织 4 1 4。我只是感到清华的文革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已经没有开展正常辩论的环境和氛围了。现在已经不是看谁讲得更有道理，而是看谁的拳头更硬了。

我心里非常希望蒯大富能吸取教训，就此罢手，不再炫耀武力，不再使用武力。但是，良好的愿望总是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几天以后，清华发生了一次大武斗。我强烈怀疑其中很重要的动因就是团派在战歌事件没有捞到好处而心生报复。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 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 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 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 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www. cnd. org/

---